

# 我是怎樣研究起梵文來的

季羨林

我是怎樣研究起梵文來的?這確實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對於這個問題，我過去沒有考慮過。我考慮得最多的反而是另一個問題：如果我現在能倒轉回去五十年的話，我是否還會走上今天這樣一條道路?然而，對於這個問題，我的答復一直是搖搖擺擺，不太明確。這裏就先不談它了。

我現在只談我是怎樣研究起梵文來的。我在大學念的是西方文學，以英文為主，輔之以德文和法文。當時清華大學雖然規定了一些必修課，但是學生還可以自由選幾門外系的課。我大概從一開始就是一個雜家，愛好的範圍很廣。我選了不少外系的課。其中之一就是朱光潛先生的“文藝心理學”。另一門是陳寅恪先生的“佛經翻譯文學”。後者以《六祖壇經》為課本。我從來就不相信任何宗教。但是對於佛教卻有濃厚的興趣。因為我知道，中國同印度有千絲萬縷的文化關係，很想瞭解一下，只是一直沒有得到機會。陳先生的課開擴了我的眼界，增強了我的興趣。我曾同幾個同學拜謁陳先生，請他開梵文課。他明確答覆，他不能開。在當時看起來，我在學習梵文方面就算是絕了望。

但是，天底下的事情偶然性有時是會起作用的。大學畢業後，我在故鄉裏的高中教了一年國文。一方面因為不結合業務；另一方面我初入社會，對有一些現象看不順眼，那一隻已經捏在手裏的飯碗大有搖搖欲墜之勢，我的心情因而非常沉重。正在這走投無路的關鍵時刻，天無絕人之路，忽然來了一個偶然的機會，我有了到德國去學習的可能。德國對梵文的研究，是頗有一點名氣的，歷史長，名人多，著作豐富，因此有很大的吸引力。各國的梵文學者很多是德國培養出來的，連印度也不例外。有了這樣一個機會，我那藏在心中很多年的宿願一旦滿足，喜悅之情是無法形容的。

到了德國，入哥廷根(Göttingen)大學從瓦爾德施米特(Ernst Waldschmidt 1897年-1985年)教授學習梵文和巴利文。他給我出的論文題目是關於印度古代俗語語法變化。從此就打下了我研究佛教混合梵文的基礎。苦幹了五年，論文通過、口試及格。由於戰爭，回國有困難，被迫留在那個小城裏。瓦爾德施米特教

授應召從軍。他的前任西克(Erail Sieg)教授年屆八旬，早已退休。這時就出來擔任教學工作。實際上只有我一個學生。西克教授是聞名全世界的研究吐火羅文的權威。費了幾十年的精力把這種語言讀通了的就是他。這位老人，雖然年屆耄耋，但是待人親切和藹，對我這個異邦的青年更是寄託著極大的希望。他再三敦促我跟他學習吐火羅文和吠陀。我卻不過他的美意，就開始學習。這時從比利時來了一個青年學者，專門跟西克教授學習吐火羅文。到了冬天，大雪蔽天，上完課以後，往往已到黃昏時分。我怕天寒路滑，老人路上出危險，經常親自陪西克先生回家。我扶著他走過白雪皚皚的長街，到了他家門口，看著他的背影消失在薄暗中，然後才回家。此景此情，到現在已相距四十年，每一憶及，溫暖還不禁湧上心頭。

當時我的處境並不美妙。在自己的祖國，戰火紛飛，幾年接不到家信，“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沒有東西吃，天天餓得暈頭轉向，頭頂上時時有轟炸機飛過，機聲震動全城，仿佛在散佈著死亡。我看西克先生並不在意，每天仍然坐在窗前苦讀不輟，還要到研究所去給我們上課。我真替他捏一把汗。但是他自己卻處之泰然。這當然會影響了我。我也在機聲嗡嗡、饑腸轆轆中終日伏案，置生死於度外，焚膏油以繼晷，同那些別人認為極端枯燥的死文字拼命。時光一轉眼就過去了幾個年頭。

如果有人要問，我這股幹勁是從哪里來的？這確實是一個比較複雜的問題，三言兩語是說不清楚的。簡單地列出幾個條條，也難免有八股之嫌。我覺得，基礎是對這門學科的重要性的認識。但是，個人的興趣與愛好也決不可缺少。我在大學時就已經逐漸認識到，研究中國思想史、佛教史、藝術史、文學史等等，如果不懂印度這些方面的歷史，是很難取得成績的。中印兩國人民有著長期的文化交流、友好往來的歷史傳統。這個傳統需要我們繼承與發展。至於個人的興趣與愛好是與這個認識有聯繫的，但又不是完全決定於認識。一個人如果真正愛上了一門學科，那麼，日日夜夜的艱苦勞動，甚至對身體的某一些折磨，都會欣然忍受，不以為意。

此外，我還想通過對這方面的研究把中國古代在這方面的光榮傳統發揚光大。人們大都認為梵文的研究在中國是一門新學問。拿近代的情況來看，這種看法確實是正確的。宋朝以後，我們同印度的來往逐漸減少。以前作為文化交流中

心的佛教，從十一二世紀開始，在印度慢慢衰微，甚至消亡。西方殖民主義東來以後，兩國的往還更是受到阻攔。往日如火如荼的文化交流早已煙消火滅。兩國人民都處在水深火熱中，什麼梵文研究，當然是談不上了。

但是，在宋代以前，特別是在唐代，情況卻完全是另一個樣子。在當時，我們研究梵文的人數是比較多、水平是比較高的。印度以外的國家能夠同我們並駕齊驅的還不多。可惜時過境遷，滄海桑田，不但印度朋友對於這一點不清楚，連我們自己也不甚了了了。

解放以後，我曾多次訪問印度。印度人民對於中國人民的熱情，深深地打動了我的心。很多印度學者也積極地探討中印兩國文化交流的歷史，從而從歷史上來論證兩國人民友好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但是，就連這一些學者也不瞭解中國過去對梵文研究有過光榮的傳統。因此，我們還有說明解釋的必要。前年春天，我又一次訪問印度，德裏大學開會歡迎我，我在致詞中談到中印文化交流的歷史要比我們現在一般人認為的要早得多。到了海得拉巴 (Hyderābād)，奧思曼 (Osmania) 大學又開會歡迎我。看來這是一個全校規模的大會，副校長（實際上就是校長）主持並致歡迎詞。他在致詞中要我講一講中國的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問題。我乍聽之下大吃一驚：這樣一個大題目我沒有準備怎麼敢亂講呢？我臨時靈機一動，改換了一個題目，就是中國研究梵文的歷史。我講到，在古代，除了印度以外，研究梵文歷史最長、成績最大的是中國。這一點中外人士注意的不多。我舉出了很多的例子。在《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裏有一段講梵文語法（聲明）的記載。唐智廣的《悉曇字記》是講梵文字母的。唐義淨的《梵語千字文》是很有趣的一部書，它用中國的老辦法來講梵文，它只列舉了大約千把個單詞：天、地、日、月、陰、陽、圓、距、晝、夜、明、暗、雷、電、風、雨等等，讓學梵文的學生背誦。義淨在序言中說：“不同舊《千字文》。若兼悉曇章讀梵本，一兩年間，即堪翻譯矣。”我們知道，梵文是同漢文完全不同的語言，語法變化異常複雜，只學習一些單詞兒，就能勝任翻譯嗎？但是，義淨那種樂觀的精神，我是非常欣賞的。此外還有唐全真的《唐梵文字》和唐禮言集的《梵語雜名》，這是兩部類似字典的書籍。《唐梵文字》同《梵語千字文》差不多。《梵語雜名》是按照分類先列漢文，後列梵文，不像現在的字典一樣按照字母順序這樣查閱方便。但是，用外國文寫成的梵文字典這部書恐怕要歸入最早的之列了。

至於唐代學習梵文的情況，我們知道得並不多。《續高僧傳》卷四《玄奘傳》說：“（玄奘）頓跡京輦，廣就諸蕃，遍學書語，行坐尋授，數日便通。”可見玄奘是跟外國人學習印度語言的。大概到了玄奘逝世後幾十年的義淨時代，學習條件才好了起來。我們上面已經講到，義淨等人編了一些學習梵語的書籍，這對學習梵語的和尚會有很大的幫助。對於這些情況，義淨在他所著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中有所敘述。《玄奘傳》說：“以貞觀年中乃於大興善寺玄證師處，初學梵語。”《師鞭傳》說：“善禁咒，閑梵語。”《大乘燈傳》說：“頗閑梵語。”《道琳傳》說：“到東印度耽摩立底國，住經三年，學梵語。”《靈運傳》說：“極閑梵語。”《大津傳》說：“泛舶月余，達尸利佛逝洲。停斯多載，解昆侖語，頗習梵書。”貞固等四人“既而附舶，俱至佛逝，學經三載，梵漢漸通”。義淨講到的這幾個和尚，有的是在中國學習梵語，有的是在印度尼西亞學習。總之，他們到印度之前，對梵語已經有所瞭解了。

上面簡略地敘述了中國唐代研究梵文的情況，說明梵文研究在中國源遠流長，並不是什麼新學問，我們今天的任務是繼承和發揚；其中當然也還包含著創新，這是不言而喻的。

我們今天要繼承和發揚的，不僅僅在語言研究方面。在其它方面，也有大量工作可做。我們都知道，翻譯成中國各族語文的印度著作，主要是佛教經典，車載斗量，汗牛充棟。這裏面包括漢文、藏文、蒙文、滿文，以及古代的回鶻文、和闐文、焉耆文、龜茲文等等。即使是佛典，其中也不僅僅限於佛教教義，有不少的書是在佛典名義下的自然科學，比如天文學和醫學等等。印度人民非常重視這些漢譯的佛典，認為這都是自己的極可寶貴的文化遺產。可惜在他們本國早已絕跡，只存在于中國的翻譯中。他們在幾十年以前就計劃從中文再翻譯回去，譯成梵文。我在解放初訪問印度的時候，曾看到過他們努力的成果。前年到印度，知道這工作還在進行。可見印度人民對待這一件工作態度是嚴肅認真的，精神是令人欽佩的。我們誠摯地希望他們會進一步作出更大的成績。我們中國人民對於這一個文化寶庫也應當作出相應的努力，認真進行探討與研究。今天世界上許多國家，比如歐美的學術比較發達的國家和東方的日本，在這方面研究工作上無不成績斐然。相形之下，我們由於種種原因顯然有點落後了。如不急起直追，則差距將愈來愈大，到了“禮失而求諸野”的時候，就將追悔莫及了。

此外，在中國浩如煙海的史籍中，有大量的有關中國與南亞、東南亞、西亞、非洲各國貿易往還、文化交流的資料。這是世界上任何國家都比不上的，是人類的瑰寶。其中關於印度的資料更是特別豐富、特別珍貴。這些資料也有待於我們的搜羅、整理、分析與研究。有一個非常可喜的現象，這就是，最近一些年以來，印度學者愈來愈重視這一方面的研究，寫出了一些水平較高的論文，翻譯了不少中國的資料。有人提出來，要寫一部完整的中印文化關係史。他們願意同中國學者協作，爲了促進中印兩國人民的傳統友誼，加強兩國人民的互相瞭解而共同努力。我覺得，我們在這方面也應當當仁不讓，把這一方面的研究工作開展起來。

至於怎樣進行梵文和與梵文有關的問題的研究，我的體會和經驗都是些老生常談，卑之無甚高論。我覺得，首先還是要認識這種研究工作的重要意義。在這個前提下，持之以恆，鍥而不捨，不怕任何困難，終會有所成就。一部分科學發展史充分證明了一個事實：只有努力苦幹、爭分奪秒、不怕艱苦攀登的人，才能登上科學的高峰。努力勝於天才，刻苦超過靈感，這就是顛撲不破的真理。如果腦袋裏總忘不掉什麼八小時工作制，朝三暮四，鬆鬆垮垮，那就什麼事情也做不成。我們古人說：“一寸光陰一寸金，寸金難買寸光陰。”誰要是不懂珍惜時間，那就等於慢性自殺。當然，我們也不能忘記：“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會工作，還要會休息，處理好工作與休息的辯證關係，緊張而又有節奏地生活下去，工作下去。

在這裏，我還想講一點個人的經歷。我在國外研究的主要是印度古代的俗語和佛教混合梵文。最後幾年也搞了點吐火羅文。應該說，我對這些學科發生了濃厚的興趣。但是，回國以後，連最起碼的書刊資料都沒有。古人說：“巧婦難爲無米之炊。”何況我連一個“巧婦”也夠不上！俗話說：“有多大碗，吃多少飯。”我只有根據碗的大小來吃飯了。換句話說，我必須改行，至少是部分地改行。我於是就東抓西撿，看看有什麼材料，就進行什麼研究。幾十年來，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雜家。有時候，也發點思舊之幽情，技癢難忍，搞一點從前搞過的東西。但是，一旦遇到資料問題，明知道國外出版了一些新書，卻是可望而不可即。只好長歎一聲，把手中的工作放下。其中酸甜苦辣的滋味，誠不足爲外人道也。

這樣就可以回到我在本文開始時提到的那一個問題：如果我現在能倒轉回去五十年的話，我是否還會走上今天這樣一條道路？我爲什麼會提出這樣一個看起

來似乎非常奇怪的問題，現在大概大家都明白了。這個問題本身就包含著一點惋惜、一點追悔、一點猶疑、一點動搖，還有一點牢騷。我之所以一直有這樣一個問題，一直又無法肯定地予以答復，就因為我執著於舊業，又無法滿足願望。明知望梅難以止渴，但有梅可望比無梅不是更好一些嗎？現在情況已經有了改變：祖國天空裏的萬里塵埃已經廓清，四化的金光大道已經輝煌燦爛地擺在我們眼前。我們西北一帶——新疆和甘肅等地區出土古代語文殘卷的佳訊時有所聞。形勢真有點逼人啊！這些古代語文或多或少都與梵文有點關係。不加強梵文的研究，我們就會像患了胃病的人，看到滿桌佳餚，卻無法下箸。加強梵文和西北古代語文的研究已刻不容緩。這正是我們努力加鞭的大好時光。困難當然還會有，而且可能還很大。但是克服困難的可能性已經存在。倘若我現在再對自己提出上面說的那一個問題，那麼我的答復是非常明確、決不含糊的：如果我現在能夠倒轉回去五十年的話，我仍然要走這樣一條道路。

1980年2月26日寫畢